

离婚风险的影响机制*

——一个综合解释模型探讨

徐安琪

提要: 国外主流文献以双方年龄、教育、宗教和种族等人口特征的相对差异来测量夫妻的异质性, 本研究认为这难以反映两性异质的真正内涵, 继而改用双方在观念、性格、旨趣、生活习惯、消费意向/习惯、子女教育和处理亲属关系等方面协调适应的同质性作为检验离婚风险的异质假说, 同时将婚姻互动论、离婚成本分析、家庭压力论、文化规范论和替代选择假说的相关变量根据中国国情加以改进后纳入一个综合分析模型, 以上海、兰州城乡 4 区域的概率抽样调查资料来检视离婚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 该异质性指标更具解释力, 异质假说的内涵得到了拓展, 而且综合分析框架在排除其他因素影响后也验证了其他相关理论。

关键词: 离婚风险 综合模型 西方分析框架改进 异质假说

自上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离婚率持续上升, 2010 年的粗离婚率从 1979 年的 0.33‰ 上升到 2.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 2011) 约增加了 6 倍。但中国现有的离婚研究大多只停留在宏观的概念化或定性论述上, 较少定量分析和检验, 尤其缺乏对微观家庭的婚姻稳定性及其影响机制的定量研究。既有的西方研究发展出多种理论, 但无论是相关理论还是一些具体测量都仍有完善的空间。

一、研究回顾和评述

(一) 已有研究的理论视角

婚姻质量论认为, 婚姻质量或婚姻幸福与婚姻离散之间的因果关系显而易见 (White, 1990)。路易斯和斯帕尼尔首次把婚姻质量和婚

* 本研究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城乡比较视野下的家庭价值观变迁研究》的阶段成果之一, 同时获上海社会科学院家庭学特色学科资助。

姻稳定性联系起来分析,他们相信,婚姻质量和稳定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即婚姻质量越高,婚姻的稳定性越好(Lewis & Spanier, 1979)。之后的不少经验研究都支持了他们的观点(Booth & White, 1980; Booth et al., 1986; 许传新, 2010)。我们的前期研究还显示,婚姻质量除了对婚姻稳定有直接的影响外,还具有中介变量的作用,其他多元因素通过婚姻质量对离婚风险起着不同方向和程度的作用,婚姻质量是婚姻稳定性最重要的预测指标(徐安琪、叶文振, 2002a)。

代际传递的假说已为众多研究所一致验证。有研究者根据全美家庭与户调查的研究发现,父母的离婚会导致女儿婚姻破裂的概率比增加70%(Bumpass et al., 1991)。阿马托(Amato, 1996)通过对在生命周期中婚姻不稳定的研究发现,如果妻子的父母离婚,那么她的离婚发生比将增加69%;如果她和丈夫的父母都曾离婚,那么她的离婚发生比将增加189%。德、英、澳大利亚等国的研究也都得出类似的结论(Amato & DeBoer, 2001; D'Onofrio et al., 2007; Diekmann & Engelhardt, 1999; Kulka & Weingarten, 1979)。

文化规范论认为,个人本位文化的社会通常更为寻求个人幸福而放弃原有的婚姻,快乐主义/幸福主义被当作与终身婚姻观念相对立的观念。即对终身婚姻深信不疑者通常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解决婚姻问题,相反,那些对离婚更为宽容的人则更可能选择离婚,去寻找更好的伴侣。有研究以婚姻稳定性为因变量做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赞成婚姻是一种终身承诺者不太可能考虑离婚(Heaton & Albrecht, 1991)。另一项对1980-2000年美国婚姻质量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也显示,认同终身婚姻的被访对婚姻关系更满意并较少离异意向(Amato et al., 2003)。在中国,文化规范论还用于解释地区和城乡之间存在的较大差异。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巨大,而且农村还因地域和信息的封闭,婚姻观念更为保守,价值规范趋同且社会凝聚力较强,“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好人不离婚,离婚不正经”以及“从一而终”的伦理文化在家庭本位的农村更难以改变(徐安琪、叶文振, 2002b)。而城市社区提倡并促进价值多元化,人们的一致性减少,社会凝聚力降低,导致离婚率上升(Glenn & Supancic, 1984; Glenn & Shelton, 1985; Breault & Kposowa, 1987)。

成本效用分析将经济学领域的成本效用理论用于社会学领域,孩子数和结婚年数则被视为两个重要的成本变量,它们都会起到稳定婚

姻关系的作用。婚姻持续的时间越长,当事人在婚姻关系上投入的个人资源越多,婚姻解体的损失也就越大(Becker et al., 1977; 贝克尔, 1998; 徐安琪、叶文振, 1999)。孩子是婚姻的特有资本,它使婚姻增值,并阻止婚姻关系的解除。孩子数与离婚的负相关已在许多研究中得到证实(Peters, 1986; Canabal, 1990; 曾毅等, 1993)。

替代选择假说最早由莱文奇(Levinger, 1976)提出,他认为婚姻稳定性是婚姻本身的吸引力、婚姻以外其他选择的诱惑(也称配偶替代)和离婚障碍平衡的结果。当阻碍离婚的因素和婚姻本身的吸引力保持不变时,其他选择的吸引力越大,婚姻受挫的危险也越大。配偶替代本身被视为具有对离婚意向的独立预测能力,控制其他因素后,配偶替代会提高离婚可能性(Udry, 1981)。之后不少研究都验证了终身婚姻承诺、经济安全、宗教信仰、对子女痛苦的担心、不想离开现居住地等会成为夫妻分手的阻力(Heaton & Albrecht, 1991; Larson & Goltz, 1989; White & Booth, 1991)。普雷维蒂和阿马托(Previti & Amato, 2003)以“维系你们婚姻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的开放性问题进行测试,结果60%的受访者自述爱情是维系婚姻的主要因素,24%认为是友情,31%回答是孩子,只有1%提及配偶替代者。由于提及替代者的比重极少,故未对婚姻解体有预测作用,而回答全是爱、友谊、相互沟通、尊重等婚姻回报者比没有提到回报者的离婚发生比更低,回答全是孩子、宗教、终身承诺等障碍者的离婚发生比是未提及障碍者的两倍。

家庭压力论主要为心理学所关注,该理论强调婚姻危机常建立在压力源/事件本身、对压力的主观认知、缓解压力所拥有的资源以及调适等多重因素的相互影响上。家庭成员若对压力的主观认知不正确,加上应对压力的支持系统不足时,便容易造成婚姻关系紧张(转引自McKenry & Price 编著, 2004; 布思, 1994)。家庭压力尤其是经济压力往往导致配偶间的冲突和互动上的障碍,降低婚姻满意感、影响婚姻稳定性(Conger et al., 1990; Kwon et al., 2003; Vinokur et al., 1996)。

此外还有异质假说。不少研究认为,双方年龄、个性、宗教信仰、种族、社会地位及其变化等方面差异比较大的婚姻通常离婚风险较高,因为这些差异容易引起更多的不一致和冲突(Bitter, 1986; Tzeng, 1992)。但也有研究报告了不同的结果,即夫妇年龄、社会阶级的差别与离婚的风险没有显著关系(Rogler & Procidano, 1989)。有学者提出,不同的夫妻异质性对离婚存在不同方向的影响,如夫妇户口、职业同类

降低离婚风险,但单位性质、政治身份同类则增加离婚风险(陆益龙, 2009)。也有研究认为,夫妻年龄差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因为它和婚姻调适或婚姻整合密切相关(Atkinson & Glass, 1985)。

婚姻互动论主要通过观察夫妻间的行为互动模式和过程来揭示一些婚姻最终走向失败的行为原因(Matthews & Wickrama, 1996)。它虽然为进一步理解离婚的成因提供了一个更贴近具体婚姻生活的观察角度,有助于提醒婚姻当事人改变不利于婚姻关系可持续发展的行为互动习惯,但它在实证研究方面的推进主要在于心理学领域,如戈特曼和列文森以实验方法破译夫妻运用语言、表情、声调、身体姿势等象征性符号中蕴含的情感密码,发现激烈的斗殴,即双方在发生冲突时较多地指责、防卫、轻蔑、阻碍谈话进行等消极互动行为,以及较少的赞同、幽默、关爱、好奇、喜悦等积极互动和情绪是婚姻不满意和离婚时间的有效预测指标(Gottman & Levenson, 2000)。社会学领域通常关心夫妻一起度过的时间和发生争吵的频率,夫妇共同参与各种活动的时间越多或婚姻互动的质量越高,其婚姻稳定性也越高(Booth et al., 1986; Hill, 1988),而冲突频率自然和婚姻解体呈正相关(Booth et al., 1985; Xu et al., 2011)。最新的一项中美比较研究则显示,美国的夫妻经常一起逛街/购物、一起参加休闲活动或参加朋友聚会等共同度过的时间越多,离婚的概率越低,而中国夫妻在一起互动的时间长短则与离婚风险无显著相关(Xu et al., 2011)。

(二) 对已有理论视角的评述和本研究框架的改进

尽管不少解释离婚风险的理论已较成熟,如社会学领域的婚姻质量论、代际传递说,但婚姻互动论、替代选择假说和家庭压力论等多为心理学领域的专题研究,因此,多数研究通常只检视自己感兴趣的理论,而仅对某些人口和社会特征变量加以控制,鲜有将不同学科视野的多种理论融入同一模型加以检验的研究。针对这一缺憾,本研究将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解释模型,以检视多种理论在排除其他层面因素的作用后是否具有独立影响。其次,婚姻质量论虽曾被国内外众多研究(包括我们的前期研究)所充分验证,但反观婚姻美满幸福的夫妻较少离婚风险的假设,或许有循环论证的缺陷,夫妻离婚自然是因为婚姻质量较差!因此,本研究不再将婚姻质量纳入解释模型。再次,西方的一些理论视角未必符合中国国情,如父母传递说尽管在西方研究中得到

有力解释,但在中国,一则被访者父母中离婚者甚少(在本研究2000多个样本中父母感情破裂/离婚的仅占1%),二则最新的一项研究表明,父母的婚姻状况作为被访者离婚风险的预测变量缺乏敏感度(Xu et al., 2011),故代际传递也不在本研究的考察视野之中。

西方解释模型在验证其他理论时还存在如下缺憾:一是几乎所有的研究在验证夫妻异质假说时,通常将年龄、教育、宗教、种族等差异作自变量,但这些变量主要是个人外在身份的差异,难以准确地反映概念的真正内涵,加上年龄和教育等差异究竟多大时才会增加离婚风险也难以界定,如有的研究以连续变量即丈夫年龄减去妻子年龄的岁差作解释变量,有的以虚拟变量即观察妻子年龄大于丈夫或丈夫大于妻子者,是否比夫妻年龄差不多的更具离婚风险,但年龄段的划分并不相同(夫妻教育差异的分类同样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以至于不同研究结果各异,由此造成指标的效度不高。而宗教、种族等变量未必适合中国的国情,我们的最新研究也显示,宗教异质性对离婚风险无显著影响(Xu et al., 2011)。况且,根据美国《婚姻与家庭杂志》最新的一项关于家庭成员宗教信仰的研究综述的梳理,夫妻宗教信仰的一致性对婚姻质量和离婚风险的影响在不同研究中呈现出相互矛盾的结果(Mahoney, 2010)。

其二,以往婚姻互动模式较多地使用夫妻一起参加各种聚会或闲暇活动以及双方发生冲突的频率等变量,其中发生冲突多者更可能离婚似乎毋庸置疑。但夫妻共同参加各种聚会或活动变量则未必适合中国国情,因为中国大部分家庭没有私家车,购物等由夫妻一起去的不多,加上女性在婚后多为连续就业,双职工家庭生存压力大,闲暇时间少,紧张的工作之余,通常作出在平时一方购物、另一方做饭,或者在休息日一方带孩子去活动,另一方在家做家务的分工;此外,周末各自回自己父母家以及分别参加自己朋友聚会的情况也很常见。因此,双方的共同活动是否能为婚姻凝聚力加分有待进一步的检验。

为了克服以往研究在测量上的缺陷并对相关的研究构架有所贡献,本研究对相关因变量和解释变量作了几项改进。

1. 因变量除了“过去一年中您曾有过和对方分手的念头吗”以外,考虑到去年的分手念头/意向未必是今后离婚行为的必经步骤,一些虽有分手一闪念甚至经常想离婚者,却常因各种分手障碍而凑合,或因关系改善又和好,而去年自己没有分手念头,但配偶却有或者双方关系可

能发生新的变故等,最后仍可能导致劳燕分飞,所以,我们增加了“对婚姻的未来进行预测通常很困难,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您认为您和配偶最终会分居或离婚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一选项,以检验这两个指标的影响因素是否有所不同。

2. 以往验证异质假说时,更多地将夫妻年龄、教育、收入差距和宗教、种族等异质性当作自变量,但是缺乏效度,本研究不纳入这些指标,而采用双方在兴趣爱好、思想观念、生活习惯、性格脾气等内在相容适应的同质性来验证其与分手念头和离婚可能性的负相关。

3. 以往检测婚姻互动模式较多地使用夫妻一起参加各种聚会或活动以及双方发生冲突的频率等变量,本研究虽仍纳入夫妻经常参与共同活动变量,但我们的假设是该变量对离婚风险无显著影响。我们还增加了夫妻双方相互交流/沟通的互动指标,同时,夫妻冲突也不考察吵架频率,而是考察被访处理冲突的常用方式,即“最近6个月,夫妻发生冲突时是否常陷入不理不睬/赌气冷战状态”、“是否常以一方动手、摔/砸东西、拒绝同房或出走而告终”两变量。

4. 家庭压力变量除了考察经济压力对离婚风险的正相关外,还将对方是否有酗酒/赌博/外遇等不良行为作为心理压力变量纳入模型。

5. 文化规范论除了检视较为封闭、保守的农村社区是否更少离婚风险外,考虑到婚姻承诺也可能增加离婚阻力,我们还假设“认同自己会尽力维持夫妻间的关系”者更少有分手意向。

6. 配偶替代变量除了测量国外常用的替代机会,即“假如您与配偶分手的话,能否找到更好的”,还增设了替代意识/想法指标,询问在多大程度上赞同“假如我和别人结婚,也许会比现在更幸福”,同时还添加了离婚障碍变量,询问“您目前的夫妻关系主要靠什么来维持”(多选),我们假设仅靠子女、舆论或为让父母放心而维系夫妻关系的被访尽管在平时凑合意识较强,但通常更具离异意向和离异可能性。

7. 鉴于在中美比较研究中婚姻经历均未显示再婚者比初婚者更具离婚风险(Xu et al., 2011),本研究将再婚分为“离异后再婚”和“丧偶后再婚”两个虚拟变量,并根据以往研究结果(徐安琪、王友竹, 1992)假设丧偶者由于大多与原配关系良好,再婚后常把对方的缺陷和原配的优点作比较,更易产生失望感和分手念头。

二、资料来源与变量说明

检验相关理论假设的资料来自上海城乡和兰州城乡 4 个社区,调查样本按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方法从上海 9 个区/县 22 个街道/镇 43 个居委会/村委会和兰州 4 个区/县 10 个街道/镇 33 个居委会/村委会中选取家庭,并以家庭中 20-65 岁成员的生日离 7 月 1 日最近者为访问对象,由经过培训的访问员入户进行问卷调查。由于婚姻关系具有很强的私密性,我们采取如下措施以增加资料的信度:一是在调查前给每个样本户都邮寄“致受访者信”,告知被访调查机构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而且调查无需记名,谈话内容保密,资料不会外泄,以取得被访的信任和知情同意(不同意的不上门);二是调查员入户时取背靠背的访问方式,即必须在夫妻一方回避的情况下询问另一方;三是在询问方法上采取委婉而不是唐突的方式,如关于离异可能性问题,我们问对象“对婚姻的未来进行预测通常很困难,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您认为您和配偶/伴侣最终会分居或离婚的可能性有多大?”

上海和兰州完成的有效样本分别为 1200 个和 1000 个,本研究使用的为目前有婚姻关系的 1934 个样本,^①其中初婚占 96.7%,再婚为 3.3%;男女样本各占 50%,市郊样本分别为 64%和 36%;市区夫妻婚姻延续的平均时间为 18.3 年,郊县为 21.1 年;52%的市区家庭有男孩,郊县则达 69%;市区家庭 39.0%存在不同程度的经济压力,4.3%存在因配偶有酗酒/赌博/外遇等问题引起的压力,郊县分别为 54.1%和 6.6%。有关变量的刻度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其中 4 个复合并标准化的变量说明如下。

1. “双方同质性”是将双方在兴趣爱好、思想观念、性格脾气、生活习惯、消费意向/习惯、教育子女方法和处理亲属关系等方面是否一致或相容(1-5 分分别表示从“很不一致/相容”到“非常一致/相容”)共 7 项加总,这 7 个项目的 $\text{Alpha} = 0.75$ 。

2. “夫妻经常参与共同活动”是将过去一年中,被访是否经常和配偶一起参加“锻炼身体/散步/看竞赛等体育活动”、“看电影/戏剧/歌舞/观博物馆等文娱活动”、“去公园/游乐园/郊外/外地/外国旅游”、

^① 另有 25 个未婚/离婚同居样本因未回答“婚姻延续时间”而丢失。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双方同质性(复合/标准化)	1909	-3.90	2.69	.00	1.000
夫妻经常参与共同活动(复合/标准化)	1908	-2.17	2.56	.00	1.000
对双方的相互交流/沟通的满意度(1-5表示从“非常不满”到“非常满意”)	1909	1	5	3.93	.798
发生冲突时常陷入不理不睬/赌气冷战状态(1-4表示从“从不”到“经常”)	1907	1	4	1.74	.697
发生冲突时常采取动手、摔/砸东西、拒绝同房或出走的处理方式(同上)	1909	1	4	1.17	.432
子女数	1909	0	5	1.32	.745
婚姻延续时间(月)	1909	0	575	231.61	129.177
家庭经济拮据压力大(0-2表示从“没有”到“严重”,复合/标准化)	1909	-.67	3.56	.00	1.000
配偶有酗酒/赌博/外遇等问题(0-2表示从“从无”到“经常”,复合/标准化)	1909	-.20	12.91	.00	1.000
认同自己会尽力维持夫妻间的关系(1-5表示从“很不认同”到“非常认同”)	1908	1	5	4.22	.914
城乡(1=市区)	1909	0	1	.64	.481
假如我和别人结婚,也许会比现在更幸福	1909	1	5	2.15	.924
假如与配偶分手,我能找到更好的	1909	1	5	2.54	1.077
夫妻关系仅靠子女、舆论或为让父母放心而维系(1=是)	1909	0	1	.24	.425
性别(1=女)	1909	0	1	.50	.500
地区(1=上海)	1909	0	1	.56	.496
丧偶后再婚(1=是)	1909	0	1	.01	.094
离异后再婚(1=是)	1909	0	1	.02	.153
过去一年中曾有过和对方分手的念头(0-3表示从“从无”到“经常”)	1909	0	3	.11	.432
和配偶最终会分居或离婚的可能性(1-4表示从“极小可能”到“很大可能”)	1909	1	5	1.25	.617

“逛街/赶集/商店购物(不包括买日常用品)”、“同学/朋友/同事的友情聚会”、“探望老人/与子女、兄弟姐妹等亲戚聚会”和“在家看电视/卡拉OK等家庭自娱自乐”等活动(0-2分别表示从“没有”到“经常”)加总之和并加以标准化,这7个项目的 $\alpha = 0.75$ 。

3. “家庭经济拮据压力大”询问在过去一年中,您家是否面临“平

时或到月底时没有足够的钱来应付家庭日常开销”、“因经济拮据向亲戚/朋友借过钱”、“有病不看医生/推迟看病/吃药/手术/吃低效药”和“因为家人下岗/失业/待业/经营亏本而降低了家庭生活水平”等经济压力简单相加的总值并标准化,这4个项目的 $\text{Alpha} = 0.83$ 。

4. “因配偶有酗酒/赌博/外遇等问题形成的压力”,也是将在过去的一年中,配偶有无酗酒、赌博、性问题(包括性生理缺陷、嫖娼、卖淫、婚外恋等)3变量相加之和(最低为0,最高为5)并加以标准化。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我们首先来看离婚风险。分析结果显示,被访者在过去一年中从无与配偶分手念头的占93.0%,偶尔有的为4.3%,有时有的占1.7%,经常有的仅为0.9%;认为最终会和配偶分居或离婚可能性很大的只占0.4%,较大的为0.8%,难说的占4.8%,可能性很小的为11.4%,不可能的达82.6%;分手念头和离婚可能性两变量的相关系数为0.49。尽管市区被访更多地承认自己有离婚念头和认为婚姻可能最终解体,但总体而言,中国婚姻仍具有相当高的凝聚力和稳定性。统计结果还显示,82.3%的被访对双方的相互交流/沟通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只有7.2%表示不大满意或很不满意;85.3%的夫妻在冲突时从不以动手、摔/砸东西、拒绝同房或出走告终,总是这样的只占0.5%;87.2%的被访认同自己会尽力维持夫妻间的关系,不认同的仅占7.1%。

为了验证根据异质假说和婚姻互动论所改进的指标的效度,我们将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在排除其他因素后来估计我们感兴趣的变量对离异念头和离异可能性的净影响。

分析结果首先支持了我们的第一个假设,即双方在观念、性格、旨趣、生活习惯、消费意向/习惯、子女教育和处理亲属关系等方面的同质性越强,婚姻的凝聚力也越强,离异的可能性就越小(参见表2-4,夫妻内在相容适应的同质性复合指数在6个模型中都具统计显著性)。

从婚姻的互动模式看,夫妻经常参与共同活动在所有6个模型中都不起作用,说明美国式的夫妻共处互动模式对离婚风险的影响和中国有所不同,我们不宜照搬西方的指标而应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加

表 2 离异念头和离异可能性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B 值)

	模型 I	模型 II
	离异念头	离异可能性
一、双方相容适应的同质性		
双方同质性	-.038***	-.061***
二、夫妻互动模式		
夫妻经常参与共同活动	-.004	-.014
对双方的相互交流/沟通的满意度	-.119***	-.110***
冲突时常陷入不理不睬/赌气冷战状态	.048***	.101***
冲突时常动手、摔/砸东西、拒绝同房或出走	.139***	.192***
三、离婚成本		
子女数	-.035*	-.023
婚姻延续时间	.000	-.000***
四、家庭压力		
因家庭经济拮据经常有压力	.036***	.024 ⁺
因配偶有酗酒/赌博/外遇等问题的压力	.045***	.053***
五、文化规范		
认同自己会尽力维持夫妻间的关系	-.028**	-.069***
城乡(市区=1)	.047*	.075*
六、结婚替代		
假如我和别人结婚,也许会比现在更幸福	.033**	.054***
假如与配偶分手,我能找到更好的	.025**	.039**
夫妻关系仅靠子女、舆论或为让父母放心而维系	.085***	.108***
七、人口特征		
性别(女性=1)	.020	-.028
地区(上海=1)	-.041*	.068*
婚姻经历(以初婚为参照)		
丧偶后再婚	.294**	.192
离异后再婚	.054	.033
常数	.317***	1.398***
R ²	.275	.252
调整后的 R ²	.268	.245
F	39.80***	35.37***

注: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3、4 同。

表 3 不同性别被访离异意向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III 女性	模型 IV 男性
一、双方相容适应的同质性		
双方同质性	-.049 **	-.024 *
二、婚姻互动模式		
夫妻经常参与共同活动	-.008	.003
对双方的相互交流/沟通的满意度	-.118 ***	-.116 ***
冲突时常陷入不理不睬/赌气冷战状态	.048 *	.055 **
冲突时常动手、摔/砸东西、拒绝同房或出走	.152 ***	.121 ***
三、离婚成本		
子女数	-.032	-.037 +
婚姻延续时间	.000	.000
四、家庭压力		
因家庭经济拮据经常有压力	.025	.043 ***
因配偶有酗酒/赌博/外遇等问题的压力	.043 ***	.040 *
五、文化规范		
认同自己会尽力维持夫妻间的关系	-.035 *	-.024
城乡(市区=1)	.071 *	.019
六、结婚替代		
假如我和别人结婚,也许会比现在更幸福	.020	.044 ***
假如与配偶分手,我能找到更好的	.040 **	.007
夫妻关系仅靠子女、舆论或为让父母放心而维系	.100 **	.069 **
七、人口特征		
地区(上海=1)	-.067 +	-.024
婚姻经历(以初婚为参照)		
丧偶后再婚	.615 ***	.117
离异后再婚	.102	.008
常数	.326 *	.326 **
R ²	.299	.246
调整后的 R ²	.287	.233
F	23.40 ***	18.04 ***

表 4 不同区域被访离异意向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V 市区	模型 VI 郊县
一、双方相容适应的同质性		
双方同质性(复合/标准化)	-.035 [*]	-.040 ^{**}
二、夫妻互动模式		
夫妻经常参与共同活动	-.006	.009
对双方的相互交流/沟通的满意度	-.130 ^{***}	-.082 ^{***}
冲突时常陷入不理不睬/赌气冷战状态	.064 ^{***}	.002
冲突时至少一方动手、摔/砸东西、拒绝同房或出走	.125 ^{***}	.188 ^{***}
三、离婚成本		
子女数	-.016	-.026
婚姻延续时间	.000	.000
四、家庭压力		
因家庭经济拮据经常有压力	.069 ^{***}	.002
因配偶有酗酒/赌博/外遇等问题的压力	.070 ^{***}	.019 [*]
五、文化规范		
认同自己会尽力维持夫妻间的关系	-.023	-.039 ^{**}
六、结婚替代		
假如我和别人结婚,也许会比现在更幸福	.038 ^{**}	.010
假如与配偶分手,我能找到更好的	.022 ⁺	.014
夫妻关系仅靠子女、舆论或为让父母放心而维系	.064 [*]	.114 ^{***}
七、人口特征		
性别(女性=1)	.039	.001
地区(上海=1)	-.050 ⁺	-.016
婚姻经历(以初婚为参照)		
丧偶后再婚	.329 ^{**}	.158
离异后再婚	-.075	.264 ^{***}
常数	.383 ^{**}	.271 [*]
R ²	.290	.308
调整后的 R ²	.280	.291
F	28.68 ^{***}	17.68 ^{***}

以改进。此外,双方的相互沟通/交流越有效,关系也越融洽,离异念头和离异可能性越少;而在发生冲突时常陷入不理不睬、赌气冷战状态,乃至采取动手打人、摔/砸东西、拒绝同房或出走等处理方式,都将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直至婚姻关系亮红灯。

回归分析结果同时还检验了成本效用假说、家庭压力论、文化规范论和婚姻替代论,其中有不少有意思的发现:如以离婚成本来说,子女越多的被访有分手念头的更少些,但未必能最终阻止其分道扬镳;结婚时间越长,个人投入和付出也越多,最终解体的可能性就越小(见表2)。从家庭压力来讲,经济压力较大者有离异意向的概率也更大,对于男性更是如此,但在女性和郊县模型中未呈显著性影响,前者或许是因为在传统上男性才被认为是养家的顶梁柱,故经济拮据更易成为男性的压力;后者可能是因为农村家庭面临经济压力的更为普遍,如本研究郊县被访完全没有感受到经济压力的只占四成,因此,经济压力对离婚风险的负面影响或被消减;而配偶有酗酒/赌博/外遇等问题,不仅会增加被访的分手念头,同时也可能最终走向离婚(参见表2-4)。^①从文化规范看,城市的文化环境使人们的凑合意识更少,有分手想法和最终采取离婚行动的概率都更大些,认同自己会尽力维持夫妻间关系的被访也较少离婚风险(见表2)。从配偶替代论看,有婚姻替代意识和替代可能的被访显然分手的念头和离婚的可能性都更大些(见表2),尤其是女性,较少会在没有更好的替代机会时产生离异念头(见表3),而夫妻关系仅靠子女、舆论或为让父母放心而维系者,无论离婚意向还是最终离婚可能性的概率都更大些(参见表2-4)。

婚史与婚姻稳定性的关系也和我们的假设基本相符,丧偶后再婚的被访更容易对现配偶不满、失望而产生分手念头(见表2),尤其是丧偶后的再婚女性(见表3模型Ⅲ),这或许与女性往往更敏锐地觉察到婚姻互动的不足,更易受婚姻冲突的负面影响有关(Bernard, 1982),丧偶女性或更易将再婚对象的不足之处与前夫的优点作比较,从而降低自己的婚姻满意度;但郊县离异后再婚的被访有离异念头的概率更大些(见表4模型Ⅵ),这或许与农村的离异观更为保守、对离婚者的负面评价更甚有关,此外,农村离异者出于生存压力而仓促再婚的或许

① 我们曾对被访或家人是否面临经常出差/应酬/加班/换岗/定额过高/同事竞争等工作压力变量进行过测试,但因与离婚风险无显著相关而未纳入模型。

更多些(如女性离异后无居所或经济能力,男性离异后孩子无人抚养急于再婚等)。总之,本研究将再婚前是离异还是丧偶分为两个虚拟变量,并分别具有独立的影响力。

此外,家庭本位和“熟人社会”的农村因其外在文化与习俗的压力,人们的离婚意向和行为也更少。表4的模型V和VI报告了如下的结果:郊区被访更能忍受夫妻冲突时陷入不理不睬、赌气冷战状态以及对方有酗酒、赌博或外遇等不良行为,而市区被访正相反。

四、结 语

本研究摒弃以往国内外研究已反复验证的对离婚风险有重要影响的婚姻质量论、代际传递论,关注异质假说和婚姻互动论并对原有的解释变量加以改进、充实,同时将离婚成本分析、家庭压力论、文化规范论和替代选择假说的相关指标加以改进后纳入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以上海、兰州城乡4区域的概率抽样调查资料来检视离婚风险的影响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尽管离婚率在上升,但中国婚姻仍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最近一年来有与配偶分手念头的比重很低,绝大多数人认同终身婚姻观,并认为夫妻最终离异的可能性很小。

本研究认为国外主流文献以双方人口特征差异来测量夫妻的异质性难以反映两性异质的真正内涵,继而改用双方在观念、性格、旨趣、生活习惯、消费意向/习惯、子女教育和处理亲属关系等方面协调适应的同质性作为自变量,结果表明该指标比以往的夫妻年龄、教育、宗教等差异更具解释力。其理论意义在于探讨了更具效度的测量指标,拓展了异质假说的内涵,其实践意义则体现在提醒年轻人在择偶时更慎重、理智,选择相互了解、协调适应同质性较强的异性作伴侣。

而夫妻经常参与共同活动对于减少中国夫妻的离婚风险缺乏解释力,说明我们不宜照搬西方的指标而应根据中国国情对相关指标加以改进,以提高其效度。此外,在夫妻发生争执后陷入不理不睬、赌气冷战的状态,乃至动手打人、摔/砸东西、拒绝同房或出走等,都将对婚姻凝聚力和婚姻稳定有明显的不良影响,因此,提倡豁达、宽容的气度和善于妥协、忍让的冲突处理模式对于化解夫妻矛盾甚为重要。而将婚

姻建立在爱情和亲情的基础上,以及终身婚姻的承诺,都将消减离婚风险。只有在相互承诺、相互尊重和相互包容、谦让中才能珍惜爱、培植爱、升华爱和更新爱,这些都是上述研究给予我们的启示和忠告。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承诺“自己会尽力维系夫妻关系”或许隐含着有些人将婚姻看作是一种责任甚至只是附和社会期待的一种无奈,换句话说,低离婚风险的稳定婚姻未必都是高质量的,离婚对个人声誉、经济安全或子女身心健康的负面影响常成为夫妻最终分手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或阻力。

本研究将不同学科视野的相关理论融入一个综合性模型,通过控制其他决定因素,不仅显示了新异质性变量的有效性,拓展了异质假说的内涵,同时也验证了婚姻互动论、离婚成本分析、家庭压力论、文化规范论和替代选择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在探究中国式离婚风险的影响机制方面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尝试。

参考文献:

- 贝克尔,加里·斯坦利,1998,《家庭论》,王献生、王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布思·波玲,1994,《家庭压力管理》,周月清等译,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 陆益龙,2009,《“门当户对”的婚姻会更稳吗?——匹配结构与离婚风险的实证分析》,《人口研究》第2期。
- ,2011,《“小皇帝”会提高婚姻稳定性吗——中国城市离婚风险的实证分析》,《学海》第3期。
- McKenry, P. C. & S. J. Price 编著,2004,《家庭压力》,郑维、杨康临、黄郁婷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徐安琪、王友竹,1991,《离异者再婚能成功吗?》,《社会》第9期。
- 徐安琪、叶文振,1999,《中国婚姻质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2a,《婚姻质量:婚姻稳定的主要预测指标》,《学术季刊》第4期。
- ,2002b,《中国婚姻研究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许传新,2010,《西部农村留守妇女婚姻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第1期。
- 曾毅、舒尔茨、王德明,1993,《上海、陕西、河北三省市的离婚分析》,《人口科学》第5期。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2011,《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1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Amato, P. R. 1996, “Explain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Divorc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8.
- Amato, P. R. & D. D. DeBoer 2001, “The Transmission of Marital Instability across Generations: Relationship Skills or Commitment to Marria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3.
- Amato, P. R., D. R. Johnson, A. Booth & S. J. Rogers 2003,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ari-

- tal Quality between 1980 and 2000. ”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5.
- Atkinson, M. P. & B. L. Glass 1985, “Marital Age Heterogamy and Homogamy. ”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7.
- Becker, G. S. ,E. M. Landes & R. T. Michael 1977,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Marital Instability.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
- Bernard, J. 1982 *The Future of Marriage*. New York: Bantam Books.
- Bitter, R. G. 1986, “The Marriage and Marital Instability: The Effects of Heterogeneity and Inflexibility. ”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8.
- Booth, A. & L. White 1980, “Thinking about Divorce. ”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2.
- Booth, A. ,D. Johnson, L. White & J. Edwards 1985, “Predicting Divorce and Permanent Separation. ”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6.
- 1986, “Divorce and Marital Instability over the Life Course. ”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7.
- Breault, K. D. & A. J. Kposowa 1987, “Explaining Divor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tudy of 3111 Counties, 1980. ”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9.
- Bumpass, L. L. & J. A. Sweet 1972, “Differentials in Marital Instability: 1970.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7.
- Bumpass, L. L. ,T. C. Martin & J. A. Sweet 1991, “The Impact of Family Background and Early Marital Factors on Marital Disruption. ”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2.
- Canabal, M. E. 1990, “An Economic Approach to Marital Dissolution in Puerto Rico. ”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2.
- Conger, R. D. ,G. H. Elder, Jr. ,F. O. Lorenz, K. J. Conger, R. L. Simons, L. B. Whitebeck, S. Huck & J. N. Melby 1990, “Linking Economic Hardship to Marital Quality and Instability. ”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2.
- Diekmann, A. & H. Engelhardt 1999, “The Social Inheritance of Divorce: Effects of Parent’s Family Type in Postwar Germany.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4.
- D’Onofrio, B. M. ,E. Turkheimer, R. E. Emery, K. P. Harden, W. S. Slutske, A. C. Heath, P. A. F. Madden & N. G. Martin 2007, “A Genetically Informed Study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Marital Instability. ”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9.
- Glenn, N. D. & B. A. Shelton 1985, “Regional Difference in Divorce in the United Sates. ”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7.
- Glenn, N. D. & M. Supancic 1984, “The Social and Demographic Correlates of Divorce and Separ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Update and Reconsideration. ”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6.
- Gottman, J. M. & R. W. Levenson 2000, “The Timing of Divorce: Predicting When a Couple Will Divorce Over a 14-Year Period. ”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2.
- Heaton, T. B. & S. L. Albrecht 1991, “Stable Unhappy Marriages. ”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3.
- Hill, M. 1988, “Marital Stability and Spouses’ Shared Time. ”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9.
- Kulka, R. & H. Weingarten 1979,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Parental Divorce in Childhood on A-

- dult Adjustment. ”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5.
- Kwon ,Hee - kyung ,M. A. Rueter ,Mi-Sook Lee ,S. Koh & Sun Wha Ok 2003, “Marital Relationships Following the Korean Economic Crisis: Applying the Family Stress Model. ”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5.
- Larson ,L. E. & J. W. Goltz 1989, “Religious Participation and Marital Commitment. ” *Review of Religious Research* 30.
- Lewis ,R. A. & G. B. Spanier 1979, “Theorizing about the Quality and Stability of Marriage. ” In W. R. Burr(ed.) , *Contemporary Theories about Family*. New York: Free Press.
- Levinger ,G. 1976,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on Marital Dissolution. ”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2.
- Mahoney ,A. 2010, “Religion in Families ,1999 - 2009: A Relational Spirituality Framework. ”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
- Mathews ,L. S. & K. A. S. Wickrama 1996, “Predicting Marital Instability from Spouse and Observer Reports of Marital Interaction. ”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8.
- Peters ,E. H. 1986, “Marriage and Divorce: Informational Constraints and Private Contracting.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
- Previti ,D. & P. R. Amato 2003, “Why Stay Married? Rewards ,Barriers ,and Marital Stability. ”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5.
- Rogler ,H. & M. Procidano 1989, “Marital Heterogamy and Marital Quality in Puerto Rican Families. ”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1.
- South ,S. J. & K. M. Lloyd 1995, “Spousal Alternatives and Marital Dissolution.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 Tzeng ,Meei - Shenn 1992, “The 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Heterogamy and Changes on Marital Dissolution for First Marriages. ”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4.
- Udry ,J. R. 1981, “Marital Alternatives and Marital Disruption. ”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3.
- Vinokur ,A. D. ,R. H. Price & R. D. Caplan 1996, “Hard Times and Hurtful Partners: How Financial Strain Affects Depression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of Unemployed Persons and Their Spouses. ”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
- White ,L. K. 1990, “Determinants of Divorce: A Review of Research in the Eighties. ”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2.
- White ,L. K. & A. Booth 1991, “Divorce over the Life Course: The Role of Marital Happiness. ”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2.
- Xu ,A. Q. ,Y. T. Zhang & P. A. Amato 2011, “Comparison of Divorce Risk Model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42.

作者单位: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杨 可

building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vorce Risk: A comprehensive model ...
..... *Xu Anqi* 109

Abstract: Instead of using spouses' age, education, religion and ethnicity as heterogeneity predictors—although these predictors are popular in the Western literature, they couldn't reflect the true contents of heterogeneity between Chinese husbands and wives—spouses' attitudes, personality, interests, life style, consumption habits, children education, and the management of kinship relations are used in this paper to test the heterogamy hypothesis of predicting divorce risk. In addition, the predicting variables from several theories such as marital interaction, the cost analysis of divorce, family stress, norm regulation and alternative selection are integrated into a comprehensive model after having these variables adapted to the Chinese context. Using data from a sampling survey collected in Shanghai and Lanzhou, this study not only shows that the improved predictors have stronger explanation power, and expand the contents of heterogamy hypothesis, but also other relevant theories are more rigorously tested with net effects in the comprehensive model.

Growth, Employment and Social Spending: Rethinking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on social policy *Liu Junqiang* 126

Abstract: There are hot debat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policy. Some conventional wisdom contends that social programs not only extract too many resources and distort market incentive mechanisms, but also undermine the work incentives of workers and harm employment. Besides, social spending is too rigid to control.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ies, and re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ocial policy,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and furthermore, the controllability of social spending. The author argues that social policy is not a short-sighted policy, but has several positive externalities. During the past three decades of high speed growth, China has been accumulating wealth and social conflicts simultaneously. In order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policy makers should consider adding welfare as the third driver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rather than relying on huge investment and instable external demand. Through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social protection, China is expected to transform the rigid, coercive stability maintaining system into a resilient and humane stability maintaining system.

The Myth of Welfare Dependency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on China's Urban Minimum Living-hood Guarantee Scheme
..... *Han Keqing & Guo Yu* 149